

KANGZHAN SHIQI DE  
ZHONGGUO DAHOUFANG ZHUANTI YANJIU

# 抗战时期的 中国大后方专题研究

杜俊华 / 著



人民出版社

KANGZHAN SHIQI DE  
ZHONGGUO DAHOUFANG ZHUANTI YANJIU

# 抗战时期的 中国大后方专题研究

杜俊华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刘伟  
责任校对：吕飞  
版式设计：孙姗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后方专题研究 / 杜俊华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8

ISBN 978 - 7 - 01 - 019455 - 4

I. ①抗… II. ①杜… III. ①抗日战争－研究－中国  
IV. ① K26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28129 号

### 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后方专题研究

KANGZHAN SHIQI DE ZHONGGUO DAHOUFANG ZHUANTI YANJIU

杜俊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天津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66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9455 - 4 定价：4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目 录

专题一 1937年四川旱灾等级确认中的政府博弈 ——以巴县和璧山为例 .....	1
一、四川省政府对旱灾的查勘和灾级的初步确定 .....	1
二、县政府与省政府在旱灾等级再确认中的初博弈 .....	4
三、博弈的复杂化：重庆行营、巴县政府、 华洋义赈会与四川省政府 .....	7
四、结语 .....	11
专题二 全面抗战前夕重庆的购粮平粜救灾 .....	13
一、平粜粮购买 .....	13
二、平粜粮的运输 .....	15
三、平粜粮售卖与粮价平抑 .....	21
四、购粮平粜：政府与商人双赢 .....	23

<b>专题三 全面抗战前夕重庆旱灾救济的社会化宣传</b> .....	26
一、多样性：社会化宣传主体 .....	26
二、社会化宣传方式的多样性.....	31
三、社会化宣传的成效.....	39
<b>专题四 重庆地方志与民国时期的重庆灾害史</b>	
——以 1936—1937 年的旱灾为例 .....	43
一、重庆地方志的种类和特点.....	43
二、重庆地方志史料在灾害史研究中的作用.....	45
三、路径探析：在灾害史研究中辨析 和运用方志.....	48
<b>专题五 华洋义赈会与全面抗战前夕的四川旱灾救济</b> .....	52
一、全面抗战前夕华洋义赈会对四川旱灾 救济的重视.....	52
二、华洋义赈会对四川旱灾的救济.....	55
三、余论.....	64
<b>专题六 重庆自来水公司对日机“大轰炸”的应对</b> .....	65
一、全面抗战初期重庆自来水公司的改制及 “黄金发展”.....	66
二、“大轰炸”对重庆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的 影响.....	69

三、重庆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对“大轰炸”的应对.....	72
四、全面抗战时期重庆自来水公司的发展成效及贡献.....	82
<b>专题七 陪都时期重庆城市近代化中的企民矛盾</b>	
——以北碚富源水电公司为例 .....	92
一、全面抗战中重庆地位跃升与北碚富源水电公司的建立.....	92
二、纠纷初起：水磨坊老板与富源水力发电公司的博弈.....	96
三、纠纷的复杂化：民众请愿团、政府与富源水力发电公司的博弈.....	99
四、矛盾的协商解决.....	102
五、小结.....	108
<b>专题八 全面抗战时期的四川平民教育</b>	
——以新都实验县为中心的考察 .....	111
一、全面抗战以前的四川平民教育概况.....	111
二、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的平民教育发展及成效.....	114
三、全面抗战时期四川平民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式.....	117
四、全面抗战时期四川平民教育运动取得成效的原因.....	124

五、全面抗战时期四川平民教育评析.....	142
<b>专题九 全面抗战时期的重庆大学教授议政</b>	
——兼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议政比较 .....	146
一、战时重庆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在中国高校中的 崛起 .....	146
二、重庆大学和西南联大的议政群体、方式 及内容 .....	149
三、战时重庆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议政之 原因分析 .....	152
<b>专题十 报纸与陪都重庆的水灾救济（1940—1946 年）.....</b>	164
一、新闻报纸对陪都重庆水灾灾况的报道 .....	164
二、新闻报纸对重庆水灾救济的呼吁、建议 和监督 .....	175
三、新闻报纸对政府救济水灾措施的报道 .....	179
<b>参考文献 .....</b>	182
<b>后记 .....</b>	187

# 专题一

## 1937年四川旱灾等级确认中的政府博弈

### ——以巴县和璧山为例

1936—1937年，四川东部多市、县发生了特大旱灾，对经济社会造成了较大的影响。面对严重旱灾，四川省政府与各市、县政府积极投入救灾的同时，在灾级和灾款数的确定方面也存在复杂的博弈。

### 一、四川省政府对旱灾的查勘和灾级的初步确定

1936—1937年，四川发生了特大旱灾。据统计，1936年1—11月，因大旱灾，重庆、巴县、江北县人口死亡总数为5769人，其中男性3608名，女性2161名，每月平均约死500人。<sup>①</sup>

<sup>①</sup> 《1936—1937年四川旱灾灾民伤亡情况》，载（重庆）中国银行：《四川月报》1937年第10卷第1期，四川大学图书馆（人文社科馆）建国前报刊资料室资料，第225页。

又据《商务日报》1937年1月31日报道：“江巴四乡贫民为生活所迫，携儿带女到市区内乞食者，日来益形增多，满街满巷，触目皆是，无法遣散。”<sup>①</sup>巴县县长罗国钧在给四川省政府的呈文中称：“乡间草根、芭蕉头、蕨根、树皮、枇杷叶、桐麻树、棕树心均已掘食殆尽。其中文峰、青木、歇马、西永、凤凰、陈家、石岗、太平、含谷、白市、跳蹬等乡闻产白泥，每日掘食者络绎不绝，饿殍载道、遍及全县八十余乡镇。”<sup>②</sup>

面对严重的旱灾，四川省政府积极查勘灾情，并确定灾级，拟定救济款数，为救灾物资的发放提供重要依据。1937年3月，四川省粮食调整委员会派勘灾员视察重灾各县，分五路出发。其中，第二路视察专员阎菊如，视察璧山、合川、江北、巴县等县。第二路的视察日程为：3月19日，赴璧山、巴县视察。3月20日晨，搭成渝路汽车抵达内江。3月22日，沿途勘查灾情，下午5时抵璧山县，当赴县府晤郭县长，约定翌日下午2时，召集该县旱灾救济会人员讨论。3月22日上午赴党部、城中做个别访问，下午开会。<sup>③</sup>

在仔细查勘灾情的基础上，四川省政府确定了各县的灾级。

① 《饥民入市，乞丐增多》，《商务日报》1937年1月31日。

② 马力：《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重庆卷），气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

③ 《四川省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旱灾视察报告》，四川省粮食调整委员会，1937年，重庆市图书馆民国文献室，第6—7页。

四川旱灾区调查表（1937年4月）<sup>①</sup>

区别	县别	灾别	灾民人数
第三区	巴县	轻灾	655718
	江北	次重灾	541638
	合川	次重灾	633130
	綦江	次重灾	331140
	璧山	次重灾	270267
	.....	.....	.....
.....	.....	.....	.....

在此次灾情确认中，巴县被确定为轻灾区，而江北、合川、璧山、江津、綦江都被确定为次重灾区。

在旱灾等级的初次确认中，四川省政府对巴县的灾级确认因一些“政治经济”因素存在着“轻估”的问题。随着“中央化”程度的加剧，重庆及附近的江巴璧诸县逐渐成为深受重庆行营<sup>②</sup>影响的区域，亲“中央政府”意识较重。但重庆地区仍归四川省管辖，故在旱灾等级确认中，四川省政府常借口重庆市富裕，能得到重庆的支持，故对重庆附近的巴县比较苛刻，以图减少救灾款。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在确定巴县旱灾等级时，把它定为轻灾区。当时的《商务日报》报道：“前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沈专员莅县报灾，列江北为次重灾区域，以巴县为轻灾，意在

① 根据1937年4月17—18日《大江日报》的“省府民厅调查表”，以及1937年4月19日《新蜀报》的《灾害调查》汇总而成。

② 重庆行营，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成立于1935年底，管辖川、滇、黔在内的西南地区，负责西南地区的军政指挥。

渝市富庶，或能自救”<sup>①</sup>。但在巴县政府看来，巴县的灾情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被确定为轻灾。

## 二、县政府与省政府在旱灾等级再确认中的初博弈

在旱灾等级被确认后，一些县的灾情继续发展，达到或超过省政府所确认的重大灾级的灾况，因此，这些县积极上报灾情，并依靠各种关系要求省府改变灾级。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巴县和璧山县。

巴县在被四川省政府初步确定为轻灾区，意味着巴县所得灾款数和田赋豁免比附近的江北县要少得多。但随着旱灾影响的不断深入，巴县在灾害中的损失比江北县更惨重。

四川 115 县夏季作物面积之灾害损失之成数（1937 年）<sup>②</sup>

县名	水稻	高粱	玉米	大豆	绿豆	花生
巴县	50.71%	46.40%	20.90%	59.10%	45.50%	7.50%
江津	57.38%	30.00%	20.00%	86.00%	40.00%	53.30%
江北	47.91%	27.50%	8.70%	58.70%	26.20%	23.30%
合川	52.01%	43.21%	13.23%	—	43.21%	28.34%
.....	.....	.....	.....	.....	.....	.....

① 《巴县灾区达七十五乡镇，应列入重灾区分》，《商务日报》1937年5月6日。

② 四川省建设厅编：《四川省农情报告》第一卷第二期，1937年10月1日，四川大学图书馆（人文社科馆）建国前报刊资料室资料，第50页。

上表显示，在1936—1937年的大旱灾中，巴县的水稻损失成数达五成多，而江北县的水稻损失只占47.91%。因此，巴县更想改变旱灾等级。

那么，怎么做才能改变巴县的旱灾灾级呢？首先，巴县政府官员亲自勘灾，并及时上报旱灾惨况，向外宣传，以造成舆论影响。1937年3月，巴县县长躬临履查旱灾，结果如下：巴县80余乡镇连旱四载，受灾人口90余万，灾情甚重，尤以三、五两区为重，前后已达十之八九，田土收获，平均仅及十之一二……<sup>①</sup> 1937年3月8日，巴县赈务会开扩大会，决定继续向省府陈报灾情，并制定表式，分令各乡镇据实报灾。<sup>②</sup> 5月，巴县县府令各乡确实具报灾况，以便派员复查分配散发赈款，短期公债情形亦饬详细报道。<sup>③</sup> 巴县赈分会根据其实际情况还制定了各乡册报灾民等级的相关标准。据当时的《商务日报》报道：“巴县政府准县振分会函……特拟订各乡册报灾民标准三点。1.极贫。(1) 种土之家，无其他生产者；(2) 孤老残废孀妇女孤儿无生活能力者；(3) 押银七十以内种田之家，而人浩繁，生产力薄弱者；(4) 小贸不能生活者。2.次贫。(1) 种田或土押银二百以内，人口浩繁，不能生活者；(2) 如有田业在五十石租，曾经悉数抵挡全无收益，人口浩繁者；(3) 壮年男丁独自一人者不赈。”<sup>④</sup> 当

<sup>①</sup> 益坚：《四川旱灾特辑》，载（重庆）中国银行：《四川月报》第10卷第4期，第14页。四川省档案馆资料，全宗号：资15-8/3。

<sup>②</sup> 《巴县赈务会开扩大会，决定继续向省府陈报灾情》，《新蜀报》1937年3月9日。

<sup>③</sup> 《巴县赈务会开扩大会，决定继续向省府陈报灾情，请予拨款赈济》，《商务日报》1937年5月14日。

<sup>④</sup> 《各县册报灾民标准》，《商务日报》1937年5月17日。

然，在上报旱灾灾情时，巴县的乡镇政府也存在夸大旱灾损失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有下列四方面：(1) 由于地方官吏以为说得惨重，外人可为募捐并可表示自己身当艰苦之才能。(2) 由于乡镇保甲长及人民希望完全免粮免役心理，故一面说收成特少以图免粮，一面说死人特多以图免役。(3) 由于地方筹振团体与外国教士等望外人捐款并表现其筹款之困难与劳绩，以上三种心理出发，各殊而必出于夸张灾情，则该记者等到处所得消息，均不免夸大失真之嫌。<sup>①</sup> (4) 所报灾情越重，所得到的灾款和物资救济就越多。

在积极上报不断严重的灾情基础上，巴县明确提出了改变灾级的要求。1937年4月27日，罗国钧电复省府，巴县灾民六十二万，现存食粮仅足敷全县四十日之用。<sup>②</sup> 要求改巴县的灾级为次重灾区。

对于巴县政府改变灾级的请求——把巴县的灾级由轻灾区改为次重灾区，四川省政府没有同意。其实，从四川省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也可以说理解。因为一方面，巴县距离西部比较富庶的重庆市较近，可以得到重庆市民众的就近救济；另一方面，如果四川省政府轻易地把巴县的灾级由轻灾区改为次重灾区，又易掀起一大批原来是轻灾区的县份申请改为次重灾区的浪潮。在此情况下，巴县政府认识到，要使省政府改变巴县旱灾灾级，仅靠县政府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还要其他力量的支持。

<sup>①</sup> 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全宗名称：重庆市振济会，全宗号：0098，目录号：1，卷号：2，档案名：灾情上报中夸大灾情的原因。

<sup>②</sup> 《巴县县长罗国钧昨访贝克》，《商务日报》1937年4月11日。

### 三、博弈的复杂化：重庆行营、巴县政府、华洋义赈会与四川省政府

为了改变灾级，巴县政府积极寻求重庆行营、重庆市政府、华洋义赈会的支持。在全面抗战前夕的1935—1937年，重庆地区是“国民政府将依赖进行持久抗战的重要之地”，巴县是国民党中央势力在西南的代表——重庆行营特别倚重的地方，故重庆地区的旱荒救济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而国民政府借救灾控制重庆地区的意图，与号称“巴壁虎”的刘湘的意愿相冲突。因此，在重庆地区旱灾大救济中，双方进行了博弈。面对四川的大旱灾，此时被内忧外患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在江西庐山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sup>①</sup>对于刘湘发行四川省赈灾公债的请求，蒋出于打压刘湘的考量，以川省拟拨赈灾公债与中央发行公债的法规不符为由，不予同意，以让刘湘在旱灾面前更加难堪和失去民心。1937年5月7日，张澜在《新新新闻》上发表的《四川的救灾与息谣》一文中也称：“……刘（湘）主席近来向中央请发赈灾公债1500万元，竟以基金未妥，为财政部议驳……”<sup>②</sup>刘湘则通过国民政府川籍高级官员张群、戴季陶，以及四川的士绅精英们向国民政府施压，迫使蒋最后不得不让步。而此时，刘湘对重庆行营的态度

<sup>①</sup> 甘典夔：《1934年和1936年四川灾情述要》，《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6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

<sup>②</sup> 张澜：《四川的救灾与息谣》，《新新新闻》1937年5月7日。

由原来的“三要”变为“三防”，即由原来的要钱、要权、要枪变为防蒋在四川驻兵、防蒋挖他的墙角、防蒋把他搞垮。<sup>①</sup>

为此，四川省政府有意降低与重庆行营关系密切的巴县的旱灾害级，有“一箭三雕”的作用：一是暗中惩罚巴县政府；二是对其他欲投靠重庆行营的县有警示作用；三是给重庆市政府制造压力，给重庆行营制造压力（因为省府的理由就是巴县离富裕的重庆比较近，可以得到重庆的支持，如果当时在重庆的重庆行营和重庆市政府募捐不力，可以造成舆论压力）。在此情况下，重庆行营为了巩固和发展在重庆地区的势力，不仅积极募款救济巴县的灾民，比如，1937年3月，重庆行营关怀巴县灾民，拨六万元办赈，<sup>②</sup>也愿意支持巴县要求省府改变灾级的诉求。同时，巴县过低的灾级和所获省府太少的救灾款，对于历来与巴县唇齿相连的重庆市政府来说，压力也比较大（包括募捐款的压力和灾民涌入城区的压力，特别是省府借口巴县离重庆比较近能够得到重庆市更多的支持）；作为以救灾为己任的全国性救灾组织——华洋义赈会<sup>③</sup>来说，当时其正在重庆搞修筑成渝路救济灾民的工赈活动，也需要重庆市政府、巴县政府的协助和支持，因此，重庆市政府和华洋义赈会也愿意帮助巴县政府。

① 谢藻生（时任重庆行营办公室主任）：《蒋介石与刘湘的勾心斗角》，《湖北文史》2007年第6期。

② 《行营关怀巴县灾民，拨六万元办赈》，《嘉陵江日报》1937年3月19日。

③ 华洋义赈会，全称为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ion），是民国最大的民间慈善组织，由中外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以人道主义赈灾为宗旨，是具有民间性、社会化、国际性的协调公益组织，多省都成立分会。

在此背景下，巴县政府采取借助重庆行营、重庆市政府和华洋义赈会的力量向四川省政府施压，以迫使四川省政府改变灾级。

1937年4月10日，巴县县长罗国钧偕同巴县赈委会王澜辑、李奎安赴曾家岩求精中学造访华洋义赈会总干事贝克（John Earl Baker），由渝分会副会长锐朴担任翻译，罗氏等将巴县灾情详为陈述：“……巴县八十余乡镇，旱连四载，重灾区域，前后已达十之八九，田土收获平均仅及十分之一二……不但将来栽插无望，即已种之小春，亦尽数焦枯，救济无望，近来人民采取树皮草根，巴县数十万灾民请命，商请贝克总干事下乡视察灾情，设法拨款举办急赈以救灾黎。”贝克总干事答称：“……至巴县灾况，抵渝后，聆听各方陈述，本人非常关切，将来待具体办法商妥后，当尽先照重灾县份散赈。”<sup>①</sup>由于华洋义赈会仅是一救灾组织，不能对四川省政府产生足以改变巴县灾级的作用，因此四川省政府对于巴县要求改变灾级的请求不予理睬。

对于省府的不理睬，4月28日，巴县代表（罗国钧等）又谒贺（国光，重庆行营代主任）请赈，报告巴县灾况。4月30日，重庆民食救济会负责人胡文澜等再谒贺，汇陈巴县灾情，请求协同救济，结果圆满。<sup>②</sup>5月初，巴县赈务分会兼主席罗国钧、副主席王澜辑又呈委员长（重庆）行营，称巴县受灾范围广，受灾严重，应列为重灾区。在呈文中，罗国钧在详呈灾况的基础上，请求行营转请省府改巴县旱灾等级为重灾区。罗县长这样阐述：“……省府核准于后，终难列入重灾区域，立受实惠，所幸钧座

<sup>①</sup> 《行营关怀巴县灾民，拨六万元办赈》，《嘉陵江日报》1937年3月19日。

<sup>②</sup> 《商务日报》1937年4月29日和5月1日的相关报道。

驻营于此，所有城乡受灾情形早在熟查洞悉之中，用特晋呈钧座鉴核，伏乞转电四川省政府暨省赈务委员会，准将属县列入重灾县份，照拨赈款救我穷黎。庶民得更生之日，而地方有复兴之望矣，事关迫切，无任翘企沾感之至，谨呈。”<sup>①</sup> 经过巴县政府和赈委会的努力，行营同意巴县政府的要求，并致电四川省政府。在重庆行营的压力下，四川省政府终将巴县列为重灾区，并配备急赈款。《大声日报》1937年6月1日第2版和《济川公报》1937年6月9日第7版都作了专门报道：巴县列为重灾区份，行营令省府照准；巴县急赈款配定一万元，省振会派表守之督办。

相比较而言，璧山的旱灾等级修改却没有巴县幸运。虽然在要求列为重灾区的活动中，璧山县的政府和士绅们都做了艰苦的努力。从当时巴县和璧山的旱灾报道来看，璧山县的旱灾比巴县的更加严重。

重庆附近县受灾人数表（1937年4月）<sup>②</sup>

县别	人口总数	灾民总数	县别	人口总数	灾民总数
江津	852763	682071	合川	791413	633110
江北	682975	546180	巴县	936741	655718
綦江	413926	331140	璧山	306618	270269

从上表可以看出，璧山的灾民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高达88%，是当时四川第三行政区受灾人数占总人口数比例最高的

<sup>①</sup> 《巴县灾区达七十五乡镇，应列入重灾区分，县赈分会电呈委员长行营，请电省政府振会拨款救灾民》，《商务日报》1937年5月6日。

<sup>②</sup> 《四川省第三行政区各县旱灾灾况》，（重庆）《大江日报》1937年4月17日。